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记者吴晶、屈婷、刘夏村)梦境中，常常是火光滔天，他，独自一人，穿梭火海边缘。

38年来，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参与过多次重特大灾难事故营救：每一场灾难，都是瞬息万变的战场；每一次救援，都是生死以赴的逆行。

右眼角的伤疤，是烧糊的拉链蹭到脸上留下的；变形的关节，是长期冷热交替埋下的病根……而他，早已习惯，在办公室备好一只行李箱，随时准备，救人于危难。

“我不能离开”

700多起灾难事故救援，成功解救被困群众1000多人——肖文儒的手机里，存着许多他参与过的救援现场照片和视频。他能准确说出每一次事故的时间和抢救人数。

“这些不是照片、数字，都是一条条人命、一个个家庭啊！”“人命关天”这四个字，早在30多年前，就烙印在肖文儒心中。

1985年冬天，山西省原大同矿务局雁崖矿井下中央变电站突发生火事故。

当23岁的肖文儒和同事们成功带着被困人员升井，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孩子！”

老人这一跪，重重地压在了他的心上，也永远地赶走了曾经的犹豫。

应急救援工作太苦、太难、太危险了！20世纪八十年代，应急救援人员很多时候是在“赌命”。

戴上呼吸器，披着浇透了凉水的草袋子，应急救援队员要在井下灾区接近人体极限的高温中工作；浓烟翻腾，他们只能闭着眼睛打密闭墙，一旦走错方向，或撞落呼吸器鼻夹，后果不堪设想……

一次救援，肖文儒亲眼目睹队友倒在井下。

“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工作咱别干了啊？”肖文儒的脑海中，自己母亲流着泪的苦苦哀求，和被救者母亲含着泪的重重一跪，最终重叠成一个声音：“我不能离开。”

选择了应急救援，就选择了与“死神”较量。记不清多少次，肖文儒和队友命悬一线。

“队长，水花打起火花了！”一次，某煤矿井下盲巷积存的几十吨煤粉发生自燃，形成随时喷发的“火山口”，高压水枪冲起煤尘，火光瞬间迸发四射。

“趴倒！”电光火石间，肖文儒想到了“二次爆炸”，不假思索地喊出命令。

话音刚落没几秒，爆炸声响彻巷道，火舌瞬间吞噬了作业空间。

趴在地上的肖文儒迅速拿起水枪对准火点，一秒、两秒……氧气越来越

黑暗中的一束光

副主任兼总工程师肖文儒
记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

稀薄，一分钟、两分钟……视线越来越模糊……

幸好，火势被及时扑灭。“如果当时晚趴下几秒，或者没有坚持继续灭火，可能我们就牺牲了。”肖文儒说。

井下二次爆炸，是矿难救援中最大的风险点。而这样的生死关，肖文儒硬闯了4次。从煤矿瓦斯爆炸到透水事故，从隧道坍塌到山体垮塌，肖文儒总是向险而奔、逆向而行。

“生命至上，只有掌握第一手情况，救援行动才能更有效。”多少年来，只要到了事故现场，肖文儒就要背着呼吸器下井勘察；他曾整晚站在井口附近指挥救援，直到天亮才发现自己被满地炸药、雷管“包围”；在瓦斯浓度高达4%以上的现场，他曾两次爬下巷道查看，力排众议调整救援方案。

“向前一点、再向前走一点。”挺进生命禁区的每一次，肖文儒都会押上“所有的砝码”。因为他相信，在漫无边际的黑暗深处，还有人等着他带去一束光。

“不惜一切代价”

肖文儒至今难以释怀，多年前大同某煤矿发生火灾事故，一开始还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上井下被困人员，但



肖文儒在办公室备好一只行李箱，随时准备出发。(图片来源：应急管理部)

由于当时技术手段落后，被困人员最终全部遇难。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他说。

今年1月，山东栖霞笏山金矿发生“1·10”重大爆炸事故，被困人员位于井下约600米的位置，救援深度较为罕见。由于地质情况复杂，不仅钻孔工作难度极高，井下涌水量也很大，形成“前有围堵后有追兵”之势。

4个钻孔“多管齐下”，相继遇到问题。肖文儒当机立断：提前增调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大地特勘队带一台高性能钻机前来增援！

这时，救援希望最大的3号钻在钻至井下521米处时，距井底目标偏移已达7.4米。

一子落而满盘活，新增救援团队及时对发生偏移的3号钻孔进行纠偏透巷。仅用4天，这条“生命通道”提前打通！

一刻不停，在部署打通4号钻孔中，肖文儒建议“先堵水再透巷”，确保了这条生命维护和监测通道始终畅通。后来证明，这个方案让转至4号钻孔下方的被困人员生存环境大大改善，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最终，11名被困人员获救，这次

事故救援也被业内誉为“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临场应变、力挽狂澜，靠的是废寝忘食的研究思考、通宵达旦的实战训练。38年来，肖文儒不管岗位、身份如何变化，他一直冲锋在救援最前线，成长为我国矿山救援的权威专家。

“加强瓦斯实时监测！”2017年秋，辽宁阜新万达煤矿发生透水事故。肖文儒在井下现场连续工作11个小时，当作业现场瓦斯浓度达到3.5%并继续上升时，他立刻组织调整通风系统，将作业现场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最终，83名被困矿工全部获救。

举棋若定，落子无悔，在一次次的生死淬炼和刀锋行走中，肖文儒成了全国应急救援系统的“老兵”。

从推广正压氧气呼吸器、高压排水软管等装备的广泛应用，到加快救援应急通信、矿用石膏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从组织起草矿山救护规程和救援条例，到“传帮带”各类现场处置和技术装备的经验……肖文儒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倡导“科学精神和热血担当缺一不可”。

他的手机上，存满了全国矿山救援大队大队长和总工的电话号码，一

有机会，他就深入基层救援单位，推广矿山救援的新知识新办法，服务于城市救援与综合救援。

“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老肖为应急救援加上了多重保险。”应急管理部矿山救援中心综合处二级调研员、副处长欧阳奇说：“他不仅是主心骨，更是指路灯。”

“一切都值了”

2021年初春，某煤矿透水事故发生的第二天，肖文儒就星夜驰援，抵达现场。

春寒料峭，救援队住的是帐篷，吃的是盒饭，每天工作到凌晨。59岁的肖文儒直到35天后才撤离，刷新了他自己最长的现场工作记录。

可是，他的心脏已经放了3个支架了，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关节炎……对于这个每年最多出差200多天，经常持续工作几十个小时的人来说，这些好像都不值得一提。

有一次，做完心脏手术不久，肖文儒又冲到一线。在电视上看到他憔悴疲惫的面孔，姐姐第一时间拨通了他的电话，近乎咆哮地问：“你不要命啦？！”他却很平静地回答：“不管多苦多

累，只要人能救出来，一切都值了。”

在工作中他雷厉风行，在生活中却平淡如水。

他不允许家人因为私事麻烦组织，也不让家人经营与他工作有交集的业务。一次，一位同学托肖文儒帮儿子找工作，他一口回绝：“对不起，我没有那个能力。”

当年的很多救援队友已改行换业，有的发了大财，劝他也“下海”，但老肖始终坚持：“其他行业有很多人干，但矿山救援需要我这30多年的实战经验，我这工作有价值。”

今年7月，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肖文儒带领14支专业救援队赶赴新乡开展抢险救援。12天没日没夜，他们吃苦受累，立下汗马功劳。但救援结束后，肖文儒第一时间带着队伍悄悄撤离。

把职务看“淡”，把事情做“精”、把人写“大”——这是肖文儒的老同事、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资产财务部二级巡视员孙国建对他的评价。

经历生死、见多离合，肖文儒的确把很多东西看得很淡，但对师生情谊却格外珍惜。

38年间，肖文儒把40多本厚厚的救援笔记中的心得经验，倾囊传给了一批“好苗子”。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三级主任科员乔天楷记得，2019年自己从部队转业来的时候，还是煤矿救援的“门外汉”，肖老师带头领着他们下井，逼着他们学习。徒弟们救援有功，他比谁都兴奋。

还有一份情，他埋在了心底。那是对家人的愧疚之情。

肖文儒的儿子上小学时，曾把对爸爸的思念凝于笔端——“我很少能看到我的爸爸，因为每天早晨我还没起床，爸爸已经离开了家；我晚上都睡着了，爸爸都还没回来。”肖文儒的母亲生前也曾对他抱怨：“我遇到困难、想找人帮忙的时候，都想不起来你。”

说到这些，这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铁汉红了眼眶。

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谁人不想？但作为一名应急救援工作者，只要呼救声起，就应生死以赴。

2019年10月1日，肖文儒作为应急管理系统的群众代表参加70周年国庆活动，登上了“众志成城”方阵彩车。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应急救援人的训词，肖文儒记在心里。

他说：“在‘全灾种、大应急’要求面前，我们要从‘救’向‘防’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坎要迈。”

肖文儒仍然时刻准备着，奔赴下一个战场……

彝族干部普法36载，“超长在线”播法细无声

本报记者王研

还有两年多，云南楚雄彝族干部李学平就要退休了。

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普法。

从“一五”到“八五”，他不但是中国普法进程的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奉献者。这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朴实汉子，一生都在研究怎样能让法律更生动地深入人心，他以润物细无声的默默耕耘，将法治这颗种子播撒在万千群众的内心深处。

在松树火把下开始普法

李学平个子不高、身材敦实、面颊黝黑，非常朴实。他至今依然清晰记得自己“一五”普法时的生涯。

1964年，李学平出生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的一个小山村。1985年，李学平中专毕业，被分配到元谋县元马区政府工作。当时的工作方式是划片，负责一个片区的人要开展普法、征税、征粮、计生等全部工作，每10天才回区政府汇报一次，很是艰苦。

“从小吃了不少苦，所以我不怕苦，反而觉得很有趣！”李学平说，那些日子，他从村民的所思所想中了解实际情况，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做思想工作，收获很大。

1986年，“一五”普法规划实施，领导考虑到李学平年轻，又是彝族干部，就派他去当地彝族群众聚居的凉山地区开展普法工作。李学平再次发扬了能吃苦的特点，跨上帆布包，踩着一双半旧的解放鞋，踏遍了山里的村村寨寨。

当时还没有村村通公路，下乡只能靠双脚，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往往已是晚上，李学平一年走坏了四双解放

鞋。“那时候，农村普遍条件艰苦，别说通电了，有的村连煤油灯都没有，我就在松树火把下普法。”李学平回忆。

“当时别说老百姓，就是我自己也对法律一知半解。”拿着普法书《九法一条例问题解答》，李学平辛辛苦苦走到村里，好不容易把村民召集齐。结果，念的人索然无味，听的人不知所云，下面人越来越少，直到走光。一位老大妈一脸茫然地说：“你到底讲了些啥，能说点我们听得懂的吗？”

李学平无比尴尬，这样下去怎么行？怎样才能让老百姓爱听普法宣传？

为此，李学平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放电影。电影放起来，村民们从十里八乡赶来，李学平就在电影放映时“插播”普法宣传。他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方式，就先把法律概念、条文“强行灌输”给大家。

可是没多久，他就受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村民们发生了矛盾纠纷，依然靠传统方法来解决，是非对错还是去找村里有威望的长者决断。

一次，李学平入村宣讲，遇到两户村民发生纠纷。他试图运用法律知识进行调解，结果村民不但没有接受他的说法，两户人还差点打了起来。

有村民到县城赶集时与当地人生发生纠纷，因势单力薄被殴打。医治好之后，他不知道该找谁去索赔，找谁来主持公道。“其实维权的法律宣传我反复讲过好多次，但老百姓没有真听进去。”李学平有点灰心丧气。

从跳脚闹骂到“民告官”的进步

1992年，李学平成为一名司法



李学平（左一）向老年人普法。受访者供图

助理员。究竟怎样才能让高深抽象的法律以平易近人的样子出现，被更多老百姓理解和接受？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在他脑海里。

当时，农村发生的多是小矛盾纠纷，但“量变引发质变”，不久当地发生了一起较大的刑事案件：两户村民因纠纷斗殴，一名村民的腿被打断，打人者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李学平借此案例向当地村民们宣传法律：“把人打伤就触犯国家的法律了，不是家族里能解决的了！法律是很严格的，一是不能打人，二是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要报警，让警察来处理！”

这之后，李学平越发注重让法律

以通俗易懂的面貌出现在老百姓面前，“我宣传的时候，法律条文要念，但更多是要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进行解释，或者用身边的例子说服他们。”

当时，农村普遍重男轻女，不让女孩子上学的现象非常普遍。李学平反复向村民们宣传不履行义务教育法的案例：“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要读书！这是国家规定的，要接受9年义务教育！如果不让孩子读书，政府会告父母，法院也会判孩子必须读书！”

苦口婆心，日复一日。“二五”普法期间，李学平欣慰地看到了自己的普法成果：一户彝族村民因土地纠纷，对

县里某部门提起了行政诉讼。“以前遇到类似事情，村民都是去机关里跳着脚闹骂，现在晓得用法律手段‘民告官’了，实在是一大进步。”李学平很有成就感。

“只要用得着我，我义不容辞”

“三五”期间，李学平到了元谋县司法局普法办，继续从事普法工作至今。回顾“一五”到“八五”的普法路，他感慨，从普法内容、方式等变化中，能看出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和巨大进步。

普法内容上，从“一五”“二五”期间主要普及宪法、开展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到之后的义务教育法，再到道路交通安全法、反家庭暴力法、民法典、乡村振兴促进法……李学平说，随着一部部与公民权利、经济民生高度相关的法律不断出台，我国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备，老百姓从中获得的安全感也越来越充足。

如今，李学平的普法工作已经告别了“交通基本靠走”，有了摩托车和装有大屏幕的普法宣传车，普法效率也越来越高。

他还与各地文艺宣传队合作编写含有法治宣传内容的花灯、彝族左脚舞歌曲，还拍摄法治宣传教育专题片《热坝说法》，设立元谋县法治文化中心，创办普法微信公众号……法律正以愈加通俗易懂的面孔，出现在群众面前。

李学平还有两年多就要退休了，他心里牵挂的依然是奋斗一生的普法事业。他说，现在农村彩礼太高，甚至根据学历“明码标价”，得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明白这是陋习，婚姻自由与彩礼无关。他说，“八五”普法启动，要制定好全县的普法规划，在退休前为“八五”普法开好局。他希望能尽快有年轻人来接自己的班，因为这项工作“太重要了”，“我喜欢普法，因为老百姓需要，这就是我最简单的信仰和工作动力。”

他还说，等退休了，自己想加入县里的老年歌舞队，通过唱歌跳舞搞普法宣传，还想到学校里去给孩子们讲讲法律知识。“如果需要，我还可以参与人民调解工作。只要用得着我，我义不容辞！”